

變遷中的緬甸僑教再訪：以歷史制度論為主的分析

陳鴻章（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宋秉仁（臺師大僑生先修部歷史科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歷史制度論為主要分析理論，並建構了僑校的類型，回顧了緬甸近百年來的僑教發展，爬梳了重要的歷史時刻與脈絡，且進行了田野調查與重要人士訪談。我們認為緬甸僑教的發展之初，即承載了清光緒年間到民國初年的保皇派與革命黨，以及隨後的國、共之爭。而這也使得緬甸僑教，在緬甸獨立建國之後，從絢爛到繁華落盡。隨著緬甸的政經社會環境流轉，以及來自台灣的支持，再加上緬甸華僑社群所具有的傳統中華文化底蘊，使得緬甸僑教於緬北再次興起。長久以來就在一個人力物力有限，且承受著各方壓力的環境下，依然堅守著中華文化傳承，以及培養華人社群子弟的傳統社會與教育責任。近年來緬甸的自由化、民主化，政治社會環境隨之開放，以及教育市場日益競爭，各主要僑校更嘗試各種可能的方式加以因應。不過，依然堅守著初心，始終沒有朝向商業化國際學校的路徑轉型。雖然，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使得緬甸僑校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因為堅守著對於「華人社群責任與教育初心」，也才能夠在二〇二一年緬甸軍事政變之後，再次為下一代華人子弟的教育與未來，燃起那希望的燈火。

關鍵字 血統論、國籍論、路徑依循、軍事政變

百川匯密壯波瀾
千秋至聖昭日月
育炎黃後裔傳中華道統
成佛國英才建海外宏基
蔣恩元¹

壹、前言

回顧緬甸僑教的發展，最早以中文私塾的型態，在緬北八莫（克欽邦），雲南籍華僑於關帝廟內設蒙館，緬南是在一八七二年，仰光廣東觀音廟開設私塾，至今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至於新式學校的出現，是始於清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年），由福建籍華僑林國重、陳金在、杜誠誥，創辦「中華義學」，且於一九〇四年在仰光百尺路上的穎川公司正式開課。² 隨著第一所新式學校型態的僑校在仰光設立之後，到了一九二一年，由當地僑領、教育界人士，及僑領曾廣庇捐贈洋房與十一點〇七英畝土地，建立了緬甸第一所高級中學「緬甸華僑中學」。雖然，緬甸華僑中學於一九六五年，因緬甸政府收歸國有政策施行而停辦，且一度在一九四二年，由於日本入侵緬甸暫時停辦。不過，緬甸華僑中學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以及緬甸的發展過程，確實培育出諸多人才。³

由此可以了解到，早在英國殖民緬甸（一八二六~一九四七年）的中後期，緬甸仰光的僑教就呈現出蓬勃的發展，且由十餘年間就能夠建立起從小學到高級中學，頗為完整的僑教體系，這也多少反映出英國殖民時期，華僑在仰光的政治、經濟實力。⁴此外，也能從諸多僑校的命名，是可以感受到那濃厚的僑民情懷。⁵不

¹ 這兩幅對聯是取自目前緬甸持續辦學中，歷史最悠久的密支那育成中學的校門牌樓。筆者於西元 2018 年首次拜訪密支那育成中學時，躬逢育成中學 90 周年校慶，所以到今年（2022 年）育成中學已經有 94 年之久。依據牌樓上所留下的訊息，對聯的撰寫者是蔣恩元先生，但何時撰寫則已不可考據詳細時間。蔣恩元先生是緬甸仰光中正中學肄業、雲南反共救國軍西盟軍區大成士官班結業，曾經服役於泰緬邊界反共救國軍，並多次進入大陸突擊。蔣先生曾擔任育成校友聯誼會會長、育成校務委員會主席、育成第一屆董事長，並獲僑委會頒發海外傳承中華文化有功獎狀，且曾被聘為僑務工作促進委員。以上關於蔣恩元先生的介紹，均引用自 華僑華人風雲錄網站，詳細網址如下 <http://www.chineseoverseas.org/index.php/celebrity/show/id/291>

² 緬甸僑教的緣起，參考自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下冊（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 年），頁 855。林蒲田主編：《華僑教育與華文教育概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年）

³ 緬甸華僑中學的歷史參考自 楊勝富：〈我知道的緬甸華僑中學百年歷史：經歷中國內戰的延續，和國共兩黨在海外僑社的競逐〉，刊登於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站，刊登日期 2021/1/25 日，網址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6412>

⁴ 在李察·考科特所提到英國殖民時期的仰光，雖然是個繁華多元的社會，但卻是一個對緬甸人充滿壓迫的狀態。一九〇〇年的仰光，僅有三分之一緬甸人，一九八三年組成的仰光是政委員會，歐洲、歐亞裔、猶太人、帕西人、中國人各有一席，而印度人與穆斯林有兩席委員。此外，印度人與中國人，則是在緬人與英國人之間扮演捐客的角色賺錢。關於英國殖民時期的仰光，請參考

過，隨著緬甸獨立建國（一九四八年）、軍事政變（一九六二年）、排華（一九六七年），以及私立學校全面國有化政策等⁶，時代的變遷、重大事件的衝擊，及政策的施行之後。晚近緬甸僑校集中於緬北，根據僑委會於二〇一八年的調查，緬甸的僑教主要分布在，曼德勒（曼德勒省）、東枝（撣邦）、臘戍（撣邦）、密支那（克欽邦）等緬北地區的省與邦。⁷

這些主要的僑校，如一貫道體系的明德學校於一九五五年創設（臘戍明德學校高中部於二〇〇三年開辦）；孔教、果文、黑猛龍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後期設立（一九八〇年晚期臘戍果文、瓦城孔教開辦高中部、二〇〇三年黑猛龍開辦高中部）；聖光中學設立於一九八二年（二〇〇二年開辦高中部）；育成學校設立於一九二〇年代晚期（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開辦高中部）。葉星指出這波高中開辦的熱潮，主要是由台灣的海外聯招所帶動，隨後進一步引發中學之間的相互比較與競爭。⁸此外，相較於英國殖民時期發展起來的僑校，這些一九五〇年代之後先後建立的僑校，校名普遍具有的是文化、宗教、地域，或是族群的色彩。而近年來，隨著緬甸政治民主化翁山政府上台，教育政策鬆綁之下，國際學校隨之發展，而且部分僑校也申請設立緬文小學。

對於緬甸僑教（僑校）百餘年來的變革，有幾個基本問題是本文試圖要去探尋的，首先，不同階段（英國殖民時期、緬甸獨立建國、政治民主化、軍事政變民主回潮等時期）僑教、僑校發展的動力為何。其次，我們又該如何去看待，或者是定位不同發展階段的僑教、僑校。此外，晚近國際學校（如緬甸新世紀國際中文學校）的設立對於僑教、僑校有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僑校本身的調整（如設置緬文小學），又有什麼樣的意涵。當然，這也可以讓我們預期未來僑教、僑校可能的發展方向。

李察·考科特：《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廖婉如（譯）（台北：馬可孛羅，2016年），頁63-68。

⁵ 這個時期設立的緬甸僑校，如仰光的福建女校、華僑女子中學、中國女子中學、華英學校，或是其他地區的僑校如敏瀨傳華學校、彬文那華僑小學、密支那華僑小學等，均有著濃厚的僑校色彩。以上所述相關資料參考自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下冊，頁856-857。

⁶ 緬甸重要歷史階段參考自顧長永：《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台北：八方文化，2015年）。陳鴻瑜：《緬甸史》（新北市：台灣商務，2016年）。

⁷ 關於緬甸主要僑教的分布情況，參考自中華民國僑委會駐緬代表處僑務組網站，詳細網址如下：<https://overseas.ocac.gov.tw/OCAC/SubSites/Pages/Detail.aspx?site=1795e9dc-59b9-4f0f-8651-7b39623fcb22&nodeid=3496&pid=511162>

⁸ 以上主要緬甸僑校創設以及開辦高中部資訊，主要參考自葉星：〈解讀緬甸華文學校的高中學歷教育〉，刊登於中國華文教育網網站，刊登日期2012/5/7日，網址為

<http://www.hwjyw.com/content/2012/05/07/24651.shtml>。雲南省僑聯：〈騰衝市僑聯參加緬甸密支那育成學校九十周年校慶〉，刊登於雲南新聞網網站，刊登日期2018/3/22日，網址為

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6108771。彥伶：〈緬甸曼德勒孔教學校歡慶五十周年校慶〉，刊登於台灣TB新聞網網站，刊登日期2016/8/30日，網址為

<http://tbnews.com.tw/general/20160830-11084.html>。楊仲青：《新世紀緬甸僑生在台灣求學經歷與生活經驗輔導工作經驗之建議》（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以及向緬甸密支那育成中學詢問該校的創設，以及發展歷程得知。

貳、類型界定與分析理論

實際進入本文所要探究的問題之前，在這一節我們首先要進行「僑生、僑教」的類型界定，其次也將簡要說明本文所要採用的分析理論。目前對於僑生、僑教等重要概念的界定，主要有「**血統論**」以及「**國籍論**」等兩大取向，而這也影響對於僑教、僑校的界定。以下，我們就先進行相關類型界定的探討。

一、類型界定

因為本文所要探究的是緬甸的僑教，所以「僑生、僑教」就是我們必須去加以界定的重要概念，同時相關或相近概念類型的討論也有必要性。只有當我們對相關的概念與類型，有所定義與區別時，也才可能回答不同時期的緬甸僑教，到底呈現出什麼樣的內涵。而僑教的轉變，是往哪一個方向，又具有什麼樣的意涵。

(一)、血統論與國籍論框架下的「僑、僑生、僑教、僑校」

首先，在僑生的定義方面，我國僑務委員會，針對僑生資格的認定，主要是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之規定。在這個辦法的規定之下，僑生回國升學有以下 1、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 2、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 3、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等幾個要件，以及 4、但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八年以上。一項但書。⁹ 在這些要件與但書當中，最為關鍵且要的是「**華裔**」這一項要件。而所謂的華裔，所指的即是華僑、華人，在僑居地所生之子女或後代，或許已經成為他國之公民、也許也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文化。¹⁰

所以，在這樣的規範之下，對於僑生的認定是相當之寬鬆的，你擁有中華民國國籍，只要你連續在海外居住超國六年，即可以僑生身分、管道回國升學，這當然是享有國民待遇。然而，即便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皆非我國公民，只要你在血統上是華人，且你滿足了該辦法的其他要件，同樣能夠以僑生身分、管道，享有回到自己國家一般的國民待遇。而採取這樣的僑生資格認定，郁漢良即認為，是基於我國在國籍的認定上，強調血緣、承認雙重國籍，採取的是屬人主義，因此不論是華僑、華人、華裔，統稱為「**華僑或僑胞**」。所以，華僑子弟回國升學，是享有僑生待遇。¹¹也因為採取「**血統論**」，所以我們對於僑、僑

⁹ 該辦法最早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發布，至今已進行二十餘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是在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一日。詳細內容與沿革請參考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如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00001>

¹⁰ 華僑指的是中國人移居他國，並未申請他國國籍，並保有中國國籍者。而華人指的是移居他國，並取得該國國籍，依然回講中文，同時也對中國文化瞭解者。關於華僑、華人、華裔等的定義，原出自於陳烈甫：《華僑學與華人學總論》（新北市：台灣商務，1987年）。參考自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上冊，頁 1-9。

¹¹ 參考自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上冊，頁 3。

生等界定，是相對寬鬆且有一定程度的彈性。

相較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對「僑」採取較為嚴格規範且清楚的界定，而這個界定取向即是「**國籍論**」的典型。早在一九五五年於印尼舉辦亞非會議時，為了緩和印尼對於華僑的疑慮，由外長周恩來與印尼外長簽訂「解決華僑國籍問題條約」，確立了海外華僑一人一國籍，採自願選擇原則。同時周恩來也鼓勵僑界：能善於與人同化，才能和人家一道前進。¹²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強調：在處理雙重國籍問題上，從一九五四年與印度簽定「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時，由周恩來總理所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是基本原則。¹³而到了一九八〇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更進一步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公民定居外國取得外國國籍，即喪失中國公民身分。¹⁴而更於一九九〇年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該法第二條明文：僑是指定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¹⁵

很明顯的，由此我們已經可以了解到，如果採取血統論，相較於採取國籍論，來加以定義「僑」，那麼接著對於「僑生、僑教、僑校」等的界定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在國籍論的框架之下，由「僑」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概念，都會是在「有無國籍」這個框架下，相對嚴格與侷限，反之如果採取的是血統論，相關概念類型所能涵蓋的範圍就會彈性且廣泛。

典型國籍論取向的概念界定，如林蒲田就明確的區隔出華僑教育、華文教育，且指出隨著華僑在海外落地生根（取得當地國籍），華僑教育勢必往華文教育的方向轉變。同時，他也明確定義：僑教與華教分別在 1.教育性質（僑教為海外國民教育，華教為當地國民族語言教育）2.教育對象（僑教對象為華僑及其子女，華教包括華僑、當地國華人非華人）3.教育宗旨與任務（僑教全面性培養，華教提供的是語言文化教育，並非全面性）4.歸屬與管理體制（僑校為中國教育之一部分，向中國政府註冊，受外館指導，學歷為中國承認；華校為他國教育組成的一部分，受所在國管制，學歷按所在國規定處理）等有明確的區隔。¹⁶

¹² 關於一九五五年這項解決華僑國籍問題條約，請參考中國僑聯：〈千萬華僑成東南亞心結 周恩來：解決雙重國籍 消除懷疑〉，刊登於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網站，刊登日期 2016/1/4 日，網址為 <http://www.chinaql.org/n1/2018/0802/c420286-30203736.html>。

¹³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強調處理雙重國籍的基本原則，請參考國務院僑辦：〈中國政府關於華僑華人國籍問題有那些基本原則？〉，刊登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刊登日期 2006/1/17 日，網址為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banshi/2006-01/17/content_160505.htm。

¹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該法詳細網址為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MmM5MDImZGQ2NzhiZjE3OTAxNjc4YmY1YWJhMTAwNzZM%3D>

¹⁵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網站，詳細網址為 <http://www.gqb.gov.cn/node2/node3/node5/node9/userobject7ai1272.html>。

¹⁶ 對於國籍論框架下，「僑、華」的區分，請參考 林蒲田主編：《華僑教育與華文教育概論》。

所以，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知，「**血統論**」下的各種概念定義，有著高度的彈性與創造性模糊可能，這是優點也同時是缺點。在這樣的創造性模糊之下，各種關於僑的政策有著一定的彈性的運用與詮釋可能性，但衍生出來的缺點即是，隨著身分類型分辨的彈性，也造成了可以將所有華文教育都可以是僑教，而華文學校也都可以稱為是僑校，但卻很難對於這些差別的意義有明確界定的缺陷。

相較之下，雖然「**國籍論**」對於僑有著明確的界定，同時也使得各種衍生概念有著高度的明確性。這確實是國籍論的優點，但事實上如果需要有有一定的創造性模糊，國籍論就會陷入缺乏彈性的困境。此外，更值得強調的是，由國籍論所衍生出來的類型定義，也出現與實際發展狀況有所出入的問題。就以「僑校、華教」概念下的僑校作為例子，我們以圖一呈現國籍論的框架下，所可能定義出的相關類型。

如圖一所示我們將林蒲田所提出，國籍論下的「華教、僑教」概念，以光譜的方式呈現，並且依照其所下的定義，將特定的實例（僑、華校）帶入討論。在這個光譜的兩端，分別是最典型的華教（華校）、僑教（僑校）。在這一個光譜之下，如馬來西亞的國民型中學、緬甸曼德勒的福慶學校等，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典型華教（華校）的定義。相較之下，於二〇二二年即將正式開課的柬埔寨中國學校，則是最為接近僑教（僑校）定義的，因為該校同時招收柬埔寨籍學生，所以沒有能夠完全符合最為嚴格典型的定義。

如果我們進一步將馬來西亞的獨中（全日制）、緬甸曼德勒孔教（非全日制）、緬甸密支那育成中學（全日制）等海外以華語為主進行教學的學校，放進這個國籍論框架下，所建構的光譜當中。我們將會發現在這樣的類型分析下，所無法迴避的理論與實際落差困境。就以馬來西亞獨中為例，很清楚的他並非是國籍論光譜下典型的僑教（僑校），但也並非是典型的華教（華校）。也許研究者可以主張，馬來西亞的獨中是介於兩種典型中的一種型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們將獨中採取這樣的界定模式加以處理，也並不合適，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緬甸的孔教學校或是緬甸密支那的育成中學。

馬來西亞的國民型中學，確實已經是馬來西亞教育體系的一環，且接受政府補助，課程也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干涉，實際上已經確實走向馬來西亞國內民族學校的性質。相較之下，馬來西亞獨中的存在，一方面不符合國籍論下的僑教或是僑校，另一方面獨中不但沒有往民族學校的方向發展，反而走出國際化的路徑。同時在華人文化價值等方面的養成，可以說是全面性的，絕非只是語言或華人文化傳承而已。甚至就華人傳統價值的養成上，可能還超過文革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規教育體系。

獨中（馬來西亞）

柬埔寨中國學校¹⁷

孔教學校（緬甸曼德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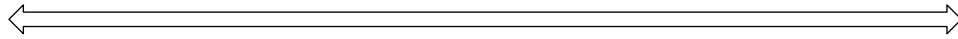
育成中學（緬甸密支那）

國民型中學（馬來西亞）

福慶學校（緬甸曼德勒）¹⁸

華教

僑教



當地國民族語言教育

華僑、當地國華人非華人

語言文化教育

他國教育組成的一部分

海外國民教育

華僑及其子女

全面性培養

中國教育之一部分

華校

僑校

圖一 國籍論下的僑教（僑校）光譜

當然，如果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規教育體系，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在於，獨中並不會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強調的「愛國教育」。若是以這一項差異進行區別，而不能將獨中視為廣義的僑校（僑教），似乎是頗為合理。而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如緬甸曼德勒的孔教學校，以及密支那的育成中學。這兩個學校同樣不符合國籍論框架下的僑校（僑教），雖然孔教並非全日制、育成中學則是全日制，但這兩個學校同樣沒有往緬甸國內的民族學校方向趨近，且在學生的養成上絕非只是語言或是所謂的文化傳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曼德勒的福慶學校，雖然一開始設校確實是華校，但晚近隨著跟中國的連結日漸深刻化之後，也朝國際化的發展趨向變革。

¹⁷ 柬埔寨中國學校是全世界第一所中國的海外學校，該校是在二〇一九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二〇三五》文件，加快建設中國特色國際海外學校精神指引下，由柬埔寨中資企業、當地華人、僑社所共同籌設。該設立於金邊，於二〇二一年八月三日正式獲得柬埔寨教育部批准。該校於 2022 年正式開學，招收初中、高中學生，招收學生有在柬中資企業子女、華僑子女、華人子女，以及柬埔寨籍學生。關於柬埔寨中國學校介紹請參考 許婧：〈柬埔寨中國學校的首批外派教師 17 日自上海出發，赴柬埔寨任教〉，刊登於新浪香港，刊登日期 2022/7/17 日，網址為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20717/0/1/2/%E9%A6%96%E6%89%B9%E6%9F%AC%E5%9F%94%E5%AF%A8%E4%B8%AD%E5%9C%8B%E5%AD%B8%E6%A0%A1%E5%A4%96%E6%B4%BE%E6%95%99%E5%B8%AB%E8%B5%B4%E6%9F%AC%E4%BB%BB%E6%95%99-14546608.html>。

關於柬埔寨中國學要也可以參考該校網頁 <http://www.ccis.org.cn/>

¹⁸ 緬甸曼德勒福慶學校全名為曼德勒福慶語言電腦學校，由瓦城福建同鄉會於一九九三年設立，原為幼兒園，主要為弘揚中華文化，以及為當地培養人力資源。該校於二〇〇八年，建立孔子課堂，這是東南亞及緬甸。第一個孔子課堂。二〇〇六年起該校為 HSK 緬北考場，近年更是前往中國留學，緬北重要報名處所。關於該校地介紹請參考 中國華文教育網：〈曼德勒福慶語言電腦學校簡介〉，刊登於中國華文教育網，刊登日期 2010/8/25 日，網址為 <http://www.hwjyw.com/info/content/2010/08/25/11211.shtml>。

筆者以往（二〇一八、二〇一九年）實地前往緬甸主要僑校田野調查，以及所進行的訪談，確實也可以證實，緬甸的主要僑校絕非僅只是華語文或是文化傳承。整個學校從華語文的學習，以及進一步落實在課程、生活教育上的，是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與傳統價值性的，對於學生的養成是全面性的。¹⁹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獨中的教育，以及所舉辦的統考，雖然不被馬來西亞政府承認，但卻被全世界十五個國家地區（包括中國、港澳、台灣），兩百多所重要大學承認，如果把台灣的海外聯招一併計算將超過四百所大學認可。²⁰此外，緬甸各主要僑校的文憑，雖然也不被緬甸政府所認可，但也被台灣的教育部承認，並且能夠以這些高中的畢業證書參加台灣所舉辦的海外聯招。

由以上簡要的討論，我們不難了解到，在國籍論框架下，所建構起來的華教（華校）、僑教（僑校）類型光譜，雖然看似有一定的邏輯性。但在實務上卻有著高度的理論與實際的落差，相關類型的分類，其實在某個程度上並不適用。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產生，關鍵在於國籍論的區分模式，並沒有能夠將國際化這個變數考量在內。很明顯的，不論是馬來西亞的獨中，或是緬甸的主要僑校，不僅沒有如國籍論所推論的，被吸納入當地國的教育體制當中，逐漸轉變為以語言與文化保存為主的族群學校。相反的這些學校朝向國際化的方向發展，這當中緬甸與馬來西亞的僑教發展有所差異的是，馬來西亞獨中的國際化不僅與種族、語言、文化接近的國家連結，更進一步與歐美接軌，而緬甸僑校目前主要是與台灣連結。

（二）、在血統論下將國際與市場概念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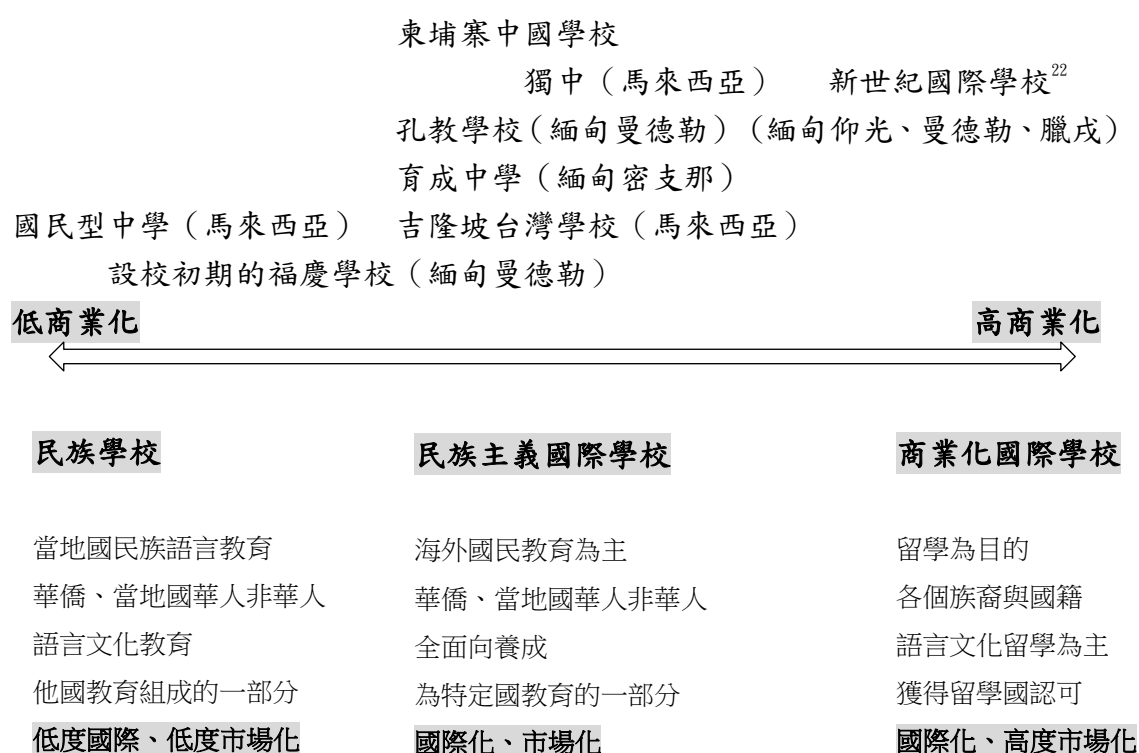
那麼，在國籍論的框架下，是否可能將國際化、市場化等概念帶入呢？基本上，在那樣的光譜上，要再納入國際化、市場化的概念是相對困難的，因為他主要的類型區隔是在國籍的有無上。所以，如過再把國際化、市場化的概念帶入，勢必會使得類型的分辨與歸類上，呈現更為雜亂，且缺乏次序的狀態。反而，我們是可以嘗試，在血統論的框架下，帶入國際化、市場化的概念，因為在血統論框架下，本來就相對空泛，缺乏類別。首先，在國際化的部分，以我們所能觀察到的這些海外學校，大致上可以區分出民族學校（minority schools）、民族主義

¹⁹ 由於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且在緬甸政變之後更需保護受訪對象，所以筆者並不強調實地拜會了那些緬甸的主要僑校，以及訪談對象。在訪談當中，僑校的重要人士(受訪者 A)即表示，學校主要採用來自台灣的教材，而且學校教育落實在生活當中有著高度的倫理價值性。甚至以往來自中華民國的一些精神標語都還可以在校園內看到，此外教育內容在中小學或許還比較沒有價值性，但進入到古文部分，價值性的內涵就逐漸增加，這是不容否認的。

²⁰ 馬來西亞獨中統考並不被馬來西亞政府承認，不過全世界卻有兩百多所大學承認，二〇二二年承認馬來西亞獨中統考成績的大學名單，請參考董總：〈二〇二二年全球各大學接受華文獨中統考資格之名單〉，刊登於馬來西亞董總網站，網址為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component/sppagebuilder/page/333http://www.chinaql.org/n1/2018/0802/c420286-30203736.html>。

國際學校（nationally dominated overseas international schools），以及商業化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s）等三大類。²¹

一般而言，我們常會將國際化與學習國際語言（如美語、英語），或者是必須與英語系國家連結，才認定為是國際化。但事實上，只要是跨越國境，或者是與其他非所在國進行連結，都可以視為是國際化，即使並非使用我們所熟悉的國際語言（如英美語）。在這其中國際化如果有低而高的排序，最低的應該是民族學校，而民族主義國際學校，及商業化國際學校，在這個光譜當中，國際化程度則要以具體個案比較。就以呈現在光譜當中的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應該是馬來西亞的獨中。



圖二 血統論下的僑教（僑校）光譜（導入國際與市場概念）

²¹ 這三種類型的海外學校，民族學校所扮演的是作為當地國少數族群語言文化維持為主，而民族主義國際學校，最為典型的是國家主導為海外公民子女教育而辦的學校。當然，該類型國際學校，未必全然僅為海外公民子女而辦，如德國所支持的海外學校，就有相當比例的非德國籍學生。至於商業化的國際學校，相較於民族主義國際學校，是以商業化的模式經營，以提供留學服務作為其主要辦學的目標。關於以上所提這幾類學校，請參考林蒲田主編：《華僑教育與華文教育概論》。邱玉蟾：《我國境內國際學校開放規範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7年）。

²² 緬甸新世紀國際學校採取的經營模式是與中國的大學簽約，引進師資與教材，以留學中國作為教育目標，同時也緬甸當地華人社團一起合作設校。關於緬甸新世紀國際學校介紹，請參考李娜：〈傳播中華文化推動教育發展——重慶師範大學與緬甸新世紀國際教育簽訂合作備忘錄〉，刊登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網站，刊登日期 2018/6/13 日，網址為 <http://www.chinaql.org/BIG5/n1/2018/0625/c419645-30083310.html>。

至於在圖二所呈現的僑校類型，另一個關鍵的區隔是在市場化（商業化）程度的高低。其中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的是以民族學校樣態呈現的僑校，這類的學校如國民型中學，或者是設校初期的福慶學校。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福慶學校與中國連結日深，引進孔子課程，並且提供各種留學中國服務之後，一方面更為國際化，另一方面也更加商業化。

其次，在光譜當中的民族主義國際學校，基本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化，不論是柬埔寨中國學校、吉隆坡台灣學校、馬來西亞獨中，或者是緬甸的孔教學校及育成中學。都可以說是特定國家教育的海外復刻版一般，或者是某種程度的修改版本。當然，在以上所提及的幾個例子當中，又以馬來西亞獨中，逐漸發展出自我的主體性，如高度的教材自編等，都是主體性的展現。

不過，隨著環境的變革，以留學需求為主商業導向的國際學校競爭，也使得這些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國際學校，不得不尋求強化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在緬甸的案例當中，隨著緬甸的新世紀國際學校，分別在曼德勒、臘戍，以及仰光設校之後，其實各主要僑校均有感受到來自於市場的競爭與壓力。受訪的緬甸僑教前輩（受訪者 B）就表示，這種以留學為主要導向的國際學校設立，其實在華人社群當中，不少家長只要是經濟能力許可，是很願意將小孩子送去的。相較之下，僑校就沒有辦法如同這些商業化的國際學校一樣，採去幾乎全面市場化的模式經營。

二、分析理論（歷史制度論）

上一節將血統論、國籍論下的僑教、僑校分類光譜討論之後，在這一節我們要針對本文所要採用的分析理論，進行簡要的說明。首先，要強調的是，本文將僑教視為是一種制度，而僑校的樣態與變革，則是僑教制度變遷的具體呈現。政治學當中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在一九八〇中期興起之後²³，就其類型的分類從兩種類到七個種類不等，這當中較為被重視且接受的是將新制度論區分為理性選擇制度論（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社會學制度論（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等三類的說法。

²⁴

這三個派別的制度論，隨著基本假設與途徑（制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的差

²³ 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興起，一般認為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而被認為較為具代表性的是 March, J., & Olsen, J. P.,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1984), pp. 734~749.

²⁴ Hall & Taylor 認為可以將新制度論區分為經濟的、理性選擇、歷史的，以及社會學等四大類別。但由於經濟與理性選擇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所以他們將新制度論區分為理性選擇、歷史的，以及社會學等三大類別。而這個區分模式廣為被接受，詳細的論述請參考 Hall, P.A., & Taylor, R.C.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y*, Vol. 44, No. 4(1996), pp. 936~957.

異，對於制度的源起 (originate) 與變遷 (change)，也各有不同的觀點。理性選擇制度論所採取的是計算途徑 (calculus approach)，其認為行動者基於極大化利益，透過策略互動，進而創造制度，而制度存續或是變革，關鍵是能否有較大的價值。相較之下，社會學制度論學派則是採取文化途徑 (culture approach)，認為制度是文化的展現，一個制度之所以被採用，或是可以持續，是因為這個制度更有正當性。至於歷史制度論的立場是折衷的 (eclectic)，他並不否認行動者創造制度，但也強調社會結構對行動者存有的限制，其更為強調的是整個制度源起與變遷過程中，關鍵時點 (critical juncture) 的影響，以及制度變遷的路徑依循 (path dependence)。²⁵

對於這三個派別的制度論，雖然理性選擇學派，對於制度與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有著明確的界定，但以行動者偏好與策略互動的理論核心，幾乎是呈現與環境脫離的模式，事實上和實際的情況會有一定程度的落差。²⁶就以筆者曾經拜訪的緬甸僑校為例，僑界籌資興辦學校，讓僑教的維持、存續，若是就個人的利益計算，事實上並非是一個理性的選擇。某位僑校的董事 (受訪者 A) 就表示：「籌資興辦學校，確實不是合法的行為，雖然在緬甸的土地上合法與不合法某個程度上似乎都還好，但還要承擔諸多來自社群內的壓力，這常常是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不過，也有另一個僑校的管理階層 (受訪者 D) 表示，雖然有些僑校校長是無給職，但這種聲譽卻不是金錢可以衡量。

所以，由筆者所進行的訪談，我們是可以得知，之所以籌資辦學，或是出任無給職的校長職務，其實都並非能僅是以理性選擇學派的「理性計算」，或是社會學學派的「社會文化價值」等單一面向來加以論斷，而是需要兼顧到行為者以及所處的制度、環境。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緬甸僑教，你更會發現當重大變革發生的時候，如軍政府於一九六〇年代，將所有私校加以國有化之後，為何緬北的僑教還能夠再一次復甦，但仰光卻相對受到壓抑。這就比較難以從理性選擇，以及社會學制度論的角度進行解讀。因此，我們選擇以歷史制度論，做為本文的主要分析理論。

歷史制度論除了具有折衷主義的特質之外，同時強調個人 (individuals)、脈絡 (context)、規則 (rules)，而歷史過程就更是受到歷史制度論重視。²⁷為了能夠建構起個人在脈絡當中，如何在一定的規則下，使得制度延續、變遷。於是歷史制度論發展出路徑依循 (path dependence)、斷續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

²⁵ 關於這三個學派的比較與說明，請參考 Hall, P.A., & Taylor, R.C.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p. 936-957.

²⁶ 對於理性選擇理論可能存有的缺陷，請參考 Koelble, T. A.,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27(1995), pp. 221-244.

²⁷ 請參考 Steinmo, S., "What i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 D. Porta & M.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2-167.

關鍵時刻或契機 (critical moments or junctures)、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 等重要概念工具，一方面充實了歷史制度論的內涵，另一方面也使得歷史制度論更具有實用性。

路徑依循是歷史制度論中重要的概念工具，但時常被簡單認定為即是過去影響未來。²⁸而事實上，制度發展的路徑，之所以會呈現出朝特定方向的前後依循，關鍵的機制在於報酬遞增效應。所謂的報酬遞增即是，相較於其他選項，目前採取這個選項所能帶來的效益，將會逐漸遞增。而如果選擇其他選項，則是要面對成本上升的狀況。正因為如此，制度當中的行動者，會有較強的動機關注在單一選項上，且持續往特定的路徑前進。而這樣的效應也可以稱為是自我強化 (self-reinforcing) 或是正向回饋 (positive feedback)。²⁹於是制度的發展就會是，很難呈現出大幅度的轉向，而是一系列的朝著特定方向的前後依循狀態。

制度除了具有路徑依循的相對穩定特質之外，在什麼情況下會有較大的轉折呢？斷續均衡、關鍵時刻或契機，提供我們解讀制度轉折的可能。當特定歷史事件發生，出現重大危機，或者是不同路徑選擇契機出現時，制度將會有迅速變動。然後，隨著制度變革確立之後，再一次的相對穩定狀態將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制度呈現出在一段時間相對穩定，而在關鍵時刻出現迅速的變革的情況，即是制度的斷續均衡。³⁰那麼，制度變革的動力又來自哪裡呢？

對於此，Thelen & Steinmo 提出制度的動力說 (institutional dynamism)，其指出 1. 社會經濟或政治脈絡的大幅改變，使得潛在的制度浮現且對政治結果有作用；2. 社會經濟或是政治權力平衡的改變，新的行動者出現並使用既有制度，為新的目標服務；3. 外在環境改變，使得既有行動者，在既有的制度中，設定新的目標；4. 政治行動者調適策略以適應制度的變革等四項，即是制度變遷的動力。

31

這幾種制度變遷動力，若套用在緬甸僑教制度的變革上，如緬甸於二戰之後尋求獨立建國，此即是重大的政治脈絡的變動。在這樣的變動之下，獨立建國之後的緬甸開始嘗試，如何透過教育來建立起一體化的國族認同。於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本來已經發展到一個相對穩定狀態的僑教制度（從小學到高中的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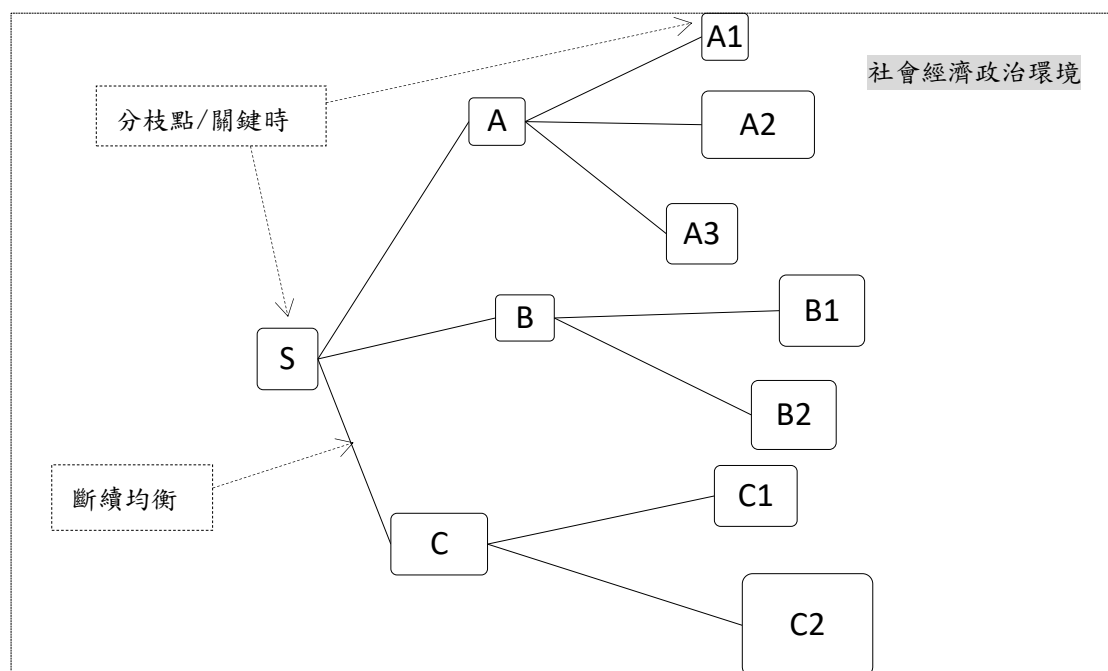
²⁸ 請參考 Mahoney, James,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4: 507.

²⁹ 關於報酬遞增請參考 Pierson,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2000), pp.252-257.

³⁰ 斷續均衡、關鍵時刻等概念的說明，請參考 Krasner, Stephen D,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6, No.2(1984), pp. 240-242.

³¹ 制度變遷動力請參考 Thelen, K., & Steinmo, 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Steinmo, K. Thelen & F.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2.

學校體系均已建立，雖然存有分歧)，就開始受到衝擊，且不得不有所變革。這個例子即是制度動力說的第一種類型。對於歷史制度論的制度變遷，我們可以進一步把 Levi 將路徑依循比喻成樹，而每一個發展路徑，有如樹幹與分枝的說法³²加以修改成圖三，我們即可清楚的了解歷史制度觀點下的制度變遷。以下就以圖三呈現，並簡要說明。



圖三 制度生成與變遷路徑（歷史制度論）

如圖三所示的是歷史制度論觀點下，制度生成與變遷的路徑，我們主要修改自 Levi將路徑依循比喻為樹的分支的說法。如圖S是整個制度發展的起點，在現有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下，行動者在關鍵的時間點，選擇走向A、B或C路徑之後。接下來，隨著制度被加以建立之後，會有一段因為自我強化，或是回饋遞增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狀態。而制度將會在某個程度上呈現出穩定與持續，直到下一個關鍵時點（事件）出現，於是制度將會再一次開啟變革的可能與方向。不過，必須要強調的是，制度變革的方向，一般而言會在一定的路徑方向前進。就如A之後就會往 A1、A2或是A3的方向前進，但整個要換成從B的路徑發展，困難度與成本就相對高。以上，介紹了本文所要採取的分析理論之後，接著我們在下節開始探緬甸僑教的初始。

³² 該說法請參考 Levi, Margaret,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9-41.

參、緬甸僑教緣起

上一節進行了僑教類型，以及分析理論的討論之後，在這一節我們將以緬甸僑教的緣起進行討論。在這個討論當中，我們會著重相關的歷史脈絡，期望能夠從歷史發展的脈絡當中，得知緬甸僑教制度建構的起點。之所以重視歷史脈絡，就如 Steinmo 所強調的，歷史制度主義者有如一個環境生物學家，要了解特定的生物或是行為，是有必要去檢視其所生存的環境或是脈絡。因此，歷史之所以值得我們去探究起碼有 1.事件都是在歷史的脈絡當中 2.行動者是在歷史過程當中學習 3.各種預期是被以往的經驗所形塑等幾個重要性。³³所以，從歷史發展的脈絡，我們有可能在特定的脈絡當中，了解到制度的出現與變遷的關鍵。

就以我們所關注的緬甸僑教而言，既有的文獻指出；緬甸的僑教，最早以中文私塾的型態，出現在緬北八莫（克欽邦），雲南籍華僑於關帝廟內設蒙館，緬南則是在一八七二年，於仰光廣東觀音廟開設私塾，至今約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而新式學校的設立，則是始於清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年），由福建籍華僑林國重、陳金在、杜誠誥等人，創辦「中華義學」，且在一九〇四年於仰光百尺路的穎川公司正式開課。³⁴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從中文私塾（一八七二年）的出現到新式學校（一九〇三年）的設立，之間約有三十年左右的間隔。理論上，在這三十年間，以中文私塾形態存在的僑教，必然是處在持續發展中的狀態，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些私塾的出現，是因為華人文化傳統當中，就是有重視教育的文化特質。但為何沒有進一步擴展成新式學校。或者說為何在中文私塾出現的三十年後，新制學校被加以設立。這裡留給我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是，為何會是在清光緒二十九年，在這個時期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脈絡，且有什麼重要的事件發生呢？而且緬甸僑教在這樣的環境脈絡下，邁開了建置新式學校的選擇之後，又為未來的僑教發展開啟了什麼樣的路徑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的是約莫在一八七〇年代前後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緬甸是呈現出什麼樣的政經社會狀態。英國於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由印度總督宣布緬甸成為印度的一省，而一八七〇年代則是處在英緬二次戰爭到第三次戰爭期間。在這個期間，英國早已在一八五二年就實質控制了緬甸南部的馬塔班、仰光、勃固等省分，而當時的緬甸的曼同國王，只能在順從或是被流放之間選擇。雖然，緬甸嘗試著透過向法國、清帝國等尋求援助與支持，但並沒有能夠改變，走向被

³³ 參考自 Steinmo, S, "What i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 D. Porta & M.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4-167.

³⁴ 緬甸僑教的早期發展，參考自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下冊，頁 855。林蒲田主編：《華僑教育與華文教育概論》。

吞併成為英屬印度一省的命運。³⁵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了解到，緬甸在這個時期，是處在一個持續抵抗英國人侵，但卻也沒有能夠改變逐漸被吞併命運的過程當中。就當權者（國王與貴族）以及多數族群的緬族而言，這是一個不願意，但卻又無可奈何的過程。而入侵者（英國）為了能夠以相對少的人力與物力，就可以掌控並穩固成果，於是分而治之、引進移民勞動力，並在某個程度上壓抑多數族群，就成為被偏好的統治模式。而在這樣的政治環境當中，各個少數族群在各個層面上，都會取得更多的空間，並出現一定的發展可能性。當然，這樣的政經社會發展空間的取得，是來自於殖民者對多數族群的壓抑。且必須注意的是，這種為了殖民統治而建構的政經社會結構，短期雖然有利於殖民統治，但長期的代價與成本勢必不可能避免。

於是就在這樣的政經社會脈絡下，殖民者將仰光建造成為當時東南亞富庶且繁華，同時又多元的城市。為了支撐仰光的建設以及持續進步，殖民者鼓勵人口移入，除了白種人之外，印度人、中國人、猶太人，以及波斯人等族裔，和緬甸人。共同形成了一個被傅尼凡稱之是「各族群並存而不混合，並且保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語言的多元社會」。但在這個多元社會，繁華與進步，緬甸人所能分享到的極為有限，取而代之的是除了英國人的歧視與不公，還有更多其他族裔外來者的蹂躪。例如印度人就在如電信、運輸、金融等領域佔有重要地位，而中國人則是將縫紉機市場壟斷。其中，又以放貸為業，被稱為是切蒂亞人的印度人，在一九三八年曾擁有緬南四分之一的耕地，最為被緬人所憎恨。³⁶

由以上對於當時歷史脈絡的說明之後，我們已經可以理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緬甸僑教是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與可能性。因為在這個由英國殖民者所建構的「多元社會」之下，來自各地、不同族裔、語言，以及文化的群體，是有一定動機透過教育來維持屬於自己族群的語言還有文化。此外，在這個時空背景之下，原本這塊土地的主人，其實也面臨著持續被併吞的壓下，根本連自我維護的能力都相當有限。當時傳統的緬甸教育是寺院教育，而英國人在實質掌控緬甸時，就設立了英式的公立學校，以及基督教教會學校；英制的公立學校貶低緬甸國王，而基督教學校則和佛教也有所不和，此舉除了引發緬甸人的恐慌，也使得一些和尚只好遷往緬北。³⁷

那麼，回到緬甸僑教發展的部分，正如在先前所提及的，為何會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中華義學設立）、清光緒三十年（中華義學開課）這個時間點，邁入創

³⁵ 緬甸的歷史請參考 陳鴻瑜：《緬甸史》（新北：台灣商務，2016年），頁 89-120。

³⁶ 傅尼凡在一九〇二年，以印度殖民官員身分到緬甸，後來曾在劍橋大學任教。關於傅尼凡隊緬甸社會的描述，以及英國殖民緬甸的統治情況，請參考李察·考科特：《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廖婉如（譯），頁 25-68。

³⁷ 參考自陳鴻瑜：《緬甸史》，頁 103。

設新式學校的僑教階段，且在隨後呈現出蓬勃的發展。對於此郁漢良認為：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以及變法失敗後，康有為亡命海外，以新式教育開展作為保皇派基地；以及孫中山革命黨以南洋為革命基地，促使日本、菲律賓、新加坡、緬甸、爪哇、馬來西亞等地，新式僑校蓬勃的發展。此外，在這個時期蓬勃發展的緬甸僑教，更因為移入緬甸各地的中國僑民，有著不同時期、地域之分，所以也發展出有地域之別的僑校。如來自於閩南、廣東，或是雲南等各省分僑民所興辦的僑校，甚至可以說是到了十戶一校的情況。³⁸對於此，李盈慧更指出：這個時期的僑教是「國家主義與實用主義並重」，海外僑教之所以受到清帝國的重視，是因為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以及革命黨孫中山等人，藉海外僑教宣傳各自政治主張。³⁹

對於以上的觀點，我們確實可以從康有為，以及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與緬甸的交集，了解到新式海外僑校除了文化、語言等傳承之外，更有著頗耐人尋味之處，而這也對日後緬甸僑教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莊國土就指出：康有為在光緒二十九年，曾到印尼巴城、泗水等地，宣傳保皇派主張，並且推動建立保皇會。清光緒三十年春，康有為從印度轉往緬甸，一方面宣傳保皇變政、君主立憲；另一方面敦促仰光僑商組織緬甸保皇分會，並以閩商莊銀安為會長，且創辦《仰光新報》為機關報。⁴⁰然而，在一九〇五年春，革命黨人秦力山到仰光之後，情勢丕變，不但莊銀安宣布退出保皇會，轉而支持革命黨，同時林國重等人所辦的中華義學、仰光新報，均以為革命黨啟迪民眾為要務。⁴¹

透過以上關於緬甸僑教緣起的簡要討論，雖然我們沒有能夠鉅細靡遺的探究清光緒年間到民國初期，緬甸全部僑校建立的詳細過程。不過，透過當時緬甸的歷史環境脈絡，以及重要僑校建立過程的事件分析。我們即可了解到，在這個時期的緬甸政經社會脈絡，是有利於僑校發展的。而促使僑校整個蓬勃的發展起來，並且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民族主義與實用性色彩的僑校為主的僑教體系，主要關鍵在於清末光緒年間內部的改革之爭，以及革命黨尋求在海外僑界建立革命基地，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性。然而，民族主義、高度實用性、地域的多元，以及承載著政治競爭的特質，也為下一個階段的緬甸僑教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肆、繁華落盡與再起

於 1921 年在仰光，由曾廣庇所捐九文台洋房及十一英畝左右土地，而創設的緬甸華僑中學，在一九六五年正式停辦。該中學在當時被稱為是緬甸華文的最

³⁸ 請參考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上冊，頁 180-196；下冊，頁 860。

³⁹ 請參考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一九一二 ~ 一九四九）》，（新北市：國史館，1997 年），頁 473-477。

⁴⁰ 參考莊國土：〈論清代華僑與海外保皇派〉，《八桂僑刊》，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8。

⁴¹ 請參考蔣永敬：《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新北市：台灣商務，2011 年），頁 291-292。

高學府，百年前就有廣大的校區，以及鐘樓等宏偉的校舍建築，雖然曾歷經日軍進入仰光之際，遭到英軍焚毀。華僑中學確實是培養出許多優秀的運動員、政治家、企業家為社會服務，蔣宋美齡、孫科、白崇禧、陳誠等黨國政要，也曾為1939 年度的畢業特刊提詞。此外，緬甸華僑中學更是捲入國共海外競爭，以及在一九六五年緬甸私校收歸國有化政策之後，正式走入歷史。⁴²緬甸華僑中學可以說就是緬甸僑教曾經絢爛到繁華落盡的代表，且在這之後他並沒有再起。然而，再次興起的是如密支那育成、瓦城孔教、明德學校、果文、黑猛龍、聖光等，位於緬北的僑校。同樣的，是在什麼樣的政經社會脈絡環境，僑校繁華落盡，而又是什麼樣的機緣與條件下，能夠在緬北再次發展起來。對於此，我們就先從緬甸的這個時期的政經環境進行討論。

雖然，緬甸的僑教在英國殖民時期（一八二六~一九四七年），一度曾經因為日本的入侵（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而有多數僑校被迫停止辦學，但這可以說是僑教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插曲。對於緬甸僑教造成重大影響的是，緬甸正式脫離英國獨立之後，一系列的政經社會局勢轉變。所以，在這裡我們就不針對日本佔領期間進行討論，而是將重心放在緬甸脫離英國獨立之後的時期。緬甸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正式宣布從英國獨立，定名為緬甸聯合邦(The Union of Burma)。雖然，翁山將軍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在撣邦彬龍(Panglong)與各民族召開會議，並在一九四七年二月，承諾尊重各族自治權益之下，簽訂了彬龍協議。不過，翁山將軍卻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仰光主持獨立前協調會議，遭到槍殺身亡。表面上，獨立後的緬甸成為一個以緬族為主，有七個省（緬族）、七個邦（各少數民族），具有歷史上的共同基礎，但少數族群又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國家。但事實上，緬甸卻是一個既統一又分離的國家，諸多少數族群的族群認同，是超過國家認同的。⁴³

這種表面上統一，但實際上控制能力相對有限的情況，筆者在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九年，前往緬甸拜訪華校時，依然呈現出事實上政府控制能力相對有限的情況。筆者在前往臘戍之前，適逢臘戍發生銀行爆炸案，媒體報導有各種說法，但當地僑校的前輩（受訪者 F）就表示；「這是山上那些扛槍的出來遞條子，沒有獲得正面或是足夠回應的一種警告」。當然，隨著時代的進步，據說以往在前往木姐等地的路上，直接攔車翻開遊客行李任意搜括的行為，已經改為收取固定額度過路費，且在車上貼上通行標誌的做法。當地僑教前輩（受訪者 H）就表示，這些扛槍的也學會了，盡量不干擾當地居民或是遊客，就是要求財，所以也同樣

⁴² 請參考楊勝富：〈我知道的緬甸華僑中學百年歷史：經歷中國內戰的延續，和國共兩黨在海外僑社的競逐〉，刊登於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站，刊登日期 2021/1/25 日，網址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6412>

⁴³ 關於緬甸獨立建國以及族群關係，請參考 顧長永：《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台北：八方，2015 年），頁 1-52。

有進步。除了臘戍之外，筆者第二次前往密支那時，適逢政府軍與少數民族關係緊繃，一些離市區稍遠的地區都被列入禁止前往的地區。很明顯的，在這樣的族群關係，以及統一卻又分離的結構之下。雖然，使得緬甸呈現出紛亂，甚至是在某種無政府狀態下，但這樣的結構卻也充滿了各種可能性與機會。

除了長期存在的族群關係紛擾之外，緬甸於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二年間，由文人政府執政，但卻處於內部分裂、經濟衰退、共黨威脅，以及少數族群分裂等難題。然而，隨著尼溫將軍（General Ne Win）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發動政變取代宇努文人政府之後，直到二〇一〇年結束軍事統治，在近五十年間，一共經歷了尼溫（一九六二-一九八八）、蘇貌（一九八八-一九九二），以及丹瑞（一九九二-二〇〇七）等三個軍政府執政。政治上的專權、經濟不振、遭到國際孤立，以及社會的閉鎖，基本上是共同的情況。不同軍政府之間有所差別的是，對社會各方面控制與操弄的程度還有能力的強弱。⁴⁴

對於這個過程，一位臘戍僑校上了年紀的僑教前輩（受訪者L）就提到：「今天跟你說貨幣重新發行，你手上所有的政府貨幣就都直接失效，沒有要讓你換，即使公告換鈔時間，也換不到，這就是軍政府。有些鋪子還因為這樣，就破產了。所以，大家後來都學乖了，只保留一定額度的政府發行貨幣小買賣流通使用，其他能換成美金或是黃金就都換。因為你是沒辦法用正常的邏輯來思考軍政府的行為，同時也沒有道理可以講。」另一位僑校較為年輕一輩的管理階層（受訪者I）也提到，「在我們十幾二十歲的那個年代，你根本就沒有工作，社會民生極為凋敝。所以，不是去挖礦，不然就是搞一些特殊的東西如毒品，但這些都是拿命在賭一樣。他很感恩他的家人，要他去讀書，且支持他來台灣讀書」。

所以，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知，在軍政府主政的年代裡，是一個閉鎖且強化社會控制的政經社會結構，各個族群都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壓迫與限制的時期。其實，獨立之後的緬甸在語言、文化等層面的變革，早在軍政府政變之前的文人政府時期就已經開始。也許是經歷了英國人的殖民統治與壓迫，讓身為多數族群的緬甸吳努文人政府，在緬甸獨立之後，就在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在宗教上強化佛教，且在教育、官方溝通語言等各方面，全面性推動緬語化。⁴⁵基本上，在這樣的政經社會脈絡下，對於僑教的發展，勢必會有著一定程度的壓力。因為當緬語成為這個國家社會正式的溝通媒介之後，將會在各個層面有一定的作用，你也不得不去學習，而僑校也將面對來自市場的挑戰。

而更進一步影響僑校發展的政策，是在一九六三年尼溫軍政府時期所通過的

⁴⁴ 關於緬甸軍事獨裁等詳細情況，請參考顧長永：《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

⁴⁵ 緬甸文人政府時期，強調佛教，以及各種緬語化的政策作為，請參考陳鴻瑜：《緬甸史》，頁198。劉務：《緬甸1988年以來的民族國家建構研究》（雲南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頁64-65。

企業國有化法（Enterprises Nationalization Law）。透過企業國有化法規，主要是將私人掌控的產業如銀行、油礦、木材等收歸國有，而在一九六五年，進一步公布了《私立學校國有化條例》，私人興辦的中小學也被收歸國有，並轉作他用。⁴⁶就在這個政策之下，數十年來所積累，有著民族主義、實用主義色彩，承載著政治競爭（清末的保皇黨與革命黨、民國之後的國共之爭）的僑教，一時之間可以說是繁華落盡一般。政府接收私校，僅留下緬文教師，其他教師均予以解聘，教師們紛紛只能轉而以補習班的模式，在每個補習班不可超過十九人的規定下，試圖延續中文教育的存在。⁴⁷對於這一段過程，受訪的僑教前輩（受訪者 G）就回憶：「當時教中文就像在犯罪一樣，根本就是他說你有問題，你就是有問題。時常要面對各種刁難」。

除了收歸國有化政策的施行，一舉將僑校沒收之外，另一個衝擊則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發生在仰光的排華事件。該事件起因於北京「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外交路線」，一開始是親中共的華校學生配戴毛澤東像徽章，以及學習毛語錄，遭到禁止而引發爭議。同時相關事件更被尼溫政府用以轉移緬甸民眾，對於軍政府不滿的一個事件，進而引發排華。此一事件造成仰光華人生命財產的損失，更深刻的影響則是華人除了離開緬甸之外，留在仰光的華人，隱藏華人認同，並加快從以往「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⁴⁸

相信經過這一個事件的衝擊，我們已經多少可以了解，為何仰光的僑教，相較於緬北僑教再次興起的時候，回應是相對冷淡的。當然，如果路徑依循的角度觀之，仰光僑教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的困境，關鍵在於一方面當緬甸的政治社會環境已經出現劇烈的變遷，但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且承載政治意識或是衝突的性格，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可能的危機。當然，後續仰光僑教沒有能夠如緬北一般復甦，也可以說是一種華僑社群的學習與自我保護。

除了探討緬甸僑教的繁華落盡之外，在這個時期另一個有必要被探究的問題在於，為何緬北的僑教，相較於仰光的長期沉寂，能夠再一次的興起。軍政府統治的初期，緬北的僑教就跟仰光的僑教一樣，事實上也經歷了一段黯淡。目前所見緬北各個主要僑校，早期也經歷了有如補習班一般的情況，或者是借用寺廟等場所授課的情況（受訪者 F）。而緬北僑校的再起，就環境因素而言，楊仲青認

⁴⁶ 參考自 Holmes, Robert. A, "Burmese Domest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Burmanization," *Asian Survey*, Vol.7, No.3(1967), pp.190-191. 顧長永：《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頁 88-91。楊仲青：〈探討緬甸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挑戰〉，《華文世界》，第 6 卷第 115 期（2015 年），頁 106。

⁴⁷ 關於當時僑校收歸國有以及後續的情況，請參考林欣靜：〈仰光僑教，火苗不熄〉，《台灣光華雜誌》，（2012 年）：網址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tw/Articles/Details?Guid=16f1831e-195d-4087-814d-047cc861e3a5>

⁴⁸ 請參考 范宏偉：〈1967 年緬甸"6.26"排華事件與緬華社會研究〉，《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3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47-72。

為一九八〇年代之後，軍政府逐漸放鬆，另外葉星也明白的指出，緬北華文高中設立的熱潮，主要來自台灣的海外聯招所帶動，隨後進一步引發中學之間的相互比較與競爭。⁴⁹對於來自於台灣的支持，緬甸僑教的前輩（受訪者 L）就表示：「老校長是比國民黨還國民黨，且他們都相當感謝台灣長期以來的支持，這包括了書籍的提供，以及教師的培訓。年輕一代比較沒有辦法體會，可以到台灣讀書那種機會的可貴。」

就環境開放的因素而言，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環境因素，但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緬北的主要僑校，曼德勒孔教、眉苗的年多、佛經等校，是在曼德勒省，而臘戍的果文、黑猛龍、明德、聖光，黑河的興華學校，密支那的育成中學等，則分別在撣邦，以及克欽邦。這些地方除了有眾多華人社群聚集之外，更有意思的是，如克欽邦的育成學校就是唯一一個可以全日授課的僑校。這也說明了，在緬甸這個多民族，且各邦各省有著一定差異的國度，很多情況是會有地區差別的。正如同一個緬甸僑校前輩（受訪者 A）所表示的：「基本上我們也沒有立案，但如果要我們把學校收掉，那這些官員朋友們，去哪裡借那種不用還的錢呢？而這也是我們在這裡的生存之道。當然其他學校是否有類似的問題，我就不清楚」。

除了借不用還的錢之外，筆者也曾在拜訪某一間華校時，該校的管理階層（受訪者 J）就表示：「這幾天董事會也正為幾件事情煩惱，一是有想要辭退特定人員，但又顧慮到介紹的軍方友人面子問題。同樣的，某一位官員也介紹了一位退休人員，希望能夠讓他來學校工作。這些都是董事會常要面對的。」當然，跟軍方維持好一定的關係也是必要的，某位僑校的前輩就表示（受訪者 K）：「在比較封閉的年代，海外聯招會的考卷是要拜託認識的軍方友人帶出去的。」。所以，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的了解到，緬北這些僑校的再次興起，也都是有他一定的社會網絡與各種人際關係的支持，絕對不會是有如商業買賣。

最後，還有一需要去討論的問題即是，為何在僑校全面被國有化之後，辦學幾乎被視為是犯罪行為，僑界是在什麼樣的動力驅使下，依然堅持要辦學呢？對於這個問題，受訪者 A 的緬甸僑教前輩表示：「陳老師不曉得你是否了解，華人在緬甸持有的身分，是比較沒有權力。所以，很多時候你需要比人家有更多可能，也要為自己的下一代找更多的機會。」另外，受訪者 K 表示：「他的主任就因為兒媳婦是緬人，深怕孫子被緬化，所以怎樣都要讓孫子有機會受到中文教育，並且可以到台灣讀書。」

當然，也有很直接的原因，正如同受訪者 E 前輩所言：「你看著老師們一個

⁴⁹楊仲青：〈探討緬甸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挑戰〉，頁 106。葉星：〈解讀緬甸華文學校的高中學歷教育〉，刊登於中國華文教育網網站，刊登日期 2012/5/7 日，網址為 <http://www.hwjyw.com/content/2012/05/07/24651.shtml>。

一個失業，有能力做、有辦法做，而且辦教育是好事，沒有理由說不去想辦法。」此外，也有年輕一輩的僑校管理階層（受訪者 I）提到：「自己就因為有華校可以讀，能夠到台灣讀書，才能在這裡服務，所以當然要去辦學。」所以，透過以上相關訪談內容的呈現，雖然辦學的動機各式各樣，有的是一種深植於文化底蘊的習慣（辦教育是好事），有的是一種因為社會環境的帶來的不平等（次等公民），當然還有一些是基於自身的經歷，而有一種對社群回饋的心。但不論如何，我們都可以從這些動機當中發現到，緬甸僑教再一次興起的動機，是有著一種利他，以及公益與社會責任的。也許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動機解讀為是，制度結構下的理性選擇，不過這也充滿了屬於華人社群的社會文化特質（如辦教育就是一件好事）。

在這一節我們了解了緬甸獨立之後，所呈現的政經社會環境脈絡，並分析為何緬甸僑教從絢爛到繁華落盡。同時我們也探究為何相較於仰光的沉寂，緬北的僑教能夠在一次興起的機會與動力之後。我們認為這一個階段的緬甸僑教，就僑教的類型而言，曾經一度因為軍政府的壓抑，僅能以少數民族的民族學校狀態存在。以補習班的方式經營，用緬文學校的課餘時間教授中文，事實上就是成為少數民族維持族群語言文化的最基本狀態。而隨後在台灣持續的支持，以緬甸的政治社會環境逐漸放寬之後，緬甸僑教再一次展現活力。雖然，多數的僑校依然只能夠在緬文學校之外的時間教授中文，而且僑校名義上還是要以教授佛經等作為掩護，但確實已經又回到有著一定民族主義色彩的國際學校型態。

伍、民主、疫情與政變

隨著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的國會選舉結束，最大黨黨魁登勝（Thein Sein）於二〇一一年二月，由國會選任為總統。緬甸正式邁開後軍政府時期的民主改革步伐，登盛於同年三月正式就任之後，進行了政治犯釋放、開放媒體出版、解除黨禁，以及解除翁山軟禁等一系列受到國際矚目的改革。雖然，這次的選舉依然是在聯合團結發展黨（USPD）嚴格的控制之下，進而取得選舉的勝利，但也終於出現有民意基礎的政府。⁵⁰對於禁錮了數十年的緬甸而言，邁開這一步除了是政治上的重大變革，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個領域，隨著開放所可能帶來的市場化與競爭。

在教育領域方面，緬甸聯邦會議於二〇一一年十二月，通過了《私立學校註冊法》，民間可以正式向緬甸教育部，申請開辦私立學校。一時之間原本的外語補習班、電腦會計補習班等，轉型為國際或技職培訓學校。而外來投資的國際學校，如新世紀國際學校、華昌國際學校等紛紛設立。⁵¹很明顯的，該法案的通過，

⁵⁰ 請參考 顧長永：《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頁 167。

⁵¹ 參考楊仲青：〈探討緬甸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挑戰〉，頁 107。

禁錮了數十年之久的教育市場，一時之間開始活絡，而市場的競爭也隨之加劇。

然而，這波教育政策的調整，隨著翁山所領導的全國民主黨於二〇一五年，改革開放後的第二次大選勝選之後，開啟進一步的變革。翁山政府取得政權之後，最重要的教育改革，即是二〇一六年通過《國民教育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變革即是，將原先採取的小學四年、國中四年，以及高中兩年，所謂的十年級制，改為小學五年、國中四年，以及高中三年，一共十二年制。而且除了原本以英文為第二外語之外，更允許地方政府在不改變課綱的情況下，應地制宜教授少數族群語言。此外，更於二〇一六年制定了《私立教育修正草案》及《技術於職業教育法修正草案》，允許國際學府或大學在緬甸合資或獨立設校，以及私立或國際職業學校設校。⁵² 翁山政府上台之後，在教育方面所採取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說就是將原本有著諸多限制的教育市場，一舉朝向與國際接軌，以及大幅度自由化、市場化的方向調整。

很明顯的，邁開自由化、民主化步伐的緬甸，除了政治上的開放之外，也在制度層面上宣示：整個教育體制是要與國際接軌，並且大幅度開放教育市場。那麼，面對這樣重大的政經社會環境變革，長期苦心耕耘但卻又處在各種人力物力資源有限的緬甸僑校，又是如何因應與看待呢？面對已經被開啟，似乎不可逆的市場化競爭，就筆者兩度前往緬甸拜訪各主要僑校的觀察，部分僑校已經籌資更新過度老舊的校舍，如二〇一八年眉苗的佛經學校正在興建教學大樓，臘戌明德中學也有教學大樓在興建當中，密支那育成中學嶄新的禮堂正式落成。另外，幼兒園、托兒所等的開設，更是一個增加可能學生來源的重要努力。而圖書、電腦等設備的購置與募集，或是更進一步開設才藝班，都是各個僑校很明顯的作為。

此外，進一步延攬台灣退休校長，前往緬甸僑校協助推動校務，以及申請設立緬文小學，也都是這一波緬甸教育市場開放下，僑校的重要努力。針對私立緬文小學的申辦而言，受訪的緬甸僑校前輩（受訪者 I）指出：「這個是有許多用意的，一方面我們不可能對於政府的措施毫無回應，另一方面這是培養生源的具體作法。家長不需要在華文學校與公立緬文小學之間奔波，自然就會願意讓孩子來就讀」。當然，對於翁山政府教育市場大幅度市場化的宣示，也有受訪的僑校前輩（受訪者 K）認為：「該努力的事情是有必要，但事實上翁山政府是否真的有這樣多資源可以推動與落實，還有很多變數」。

當然，也有受訪的僑校前輩（受訪者 D）指出：「僑校是鄉里共同籌資設立，擔負一定的社會責任（貧苦學生一樣有受教育的需求），收費更是無法與打著高品質菁英教育的國際學校比擬，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面對競爭更是有說不出的難

⁵² 參考楊仲青：〈緬甸教育制度的改革對華校發展之衝擊〉，《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學報》，第 7 期（2016 年），頁 98-102。

處」。此外，更有僑校管理階層（受訪者 H）提到：「近年來自中國方面的支持雖然增加（如外派師資、僑校辦學經費支持等），但如新世紀等國際學校，即是來自中國教育商業集團，打著有中國的特定省分師範大學認證與師資與當地僑界人士合資設立。你們台灣人、日本人來了都會回去，但中國人來了就不走了。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與現實，我們也要有所警惕。」。

透過以上筆者的觀察，以及緬甸僑教前輩的看法，我們不難了解到，在緬甸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之後，社會經濟與教育市場，確實是朝向市場化與更加競爭的路徑發展。緬甸各個僑校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但在背負著一定的社會與教育責任，以及本來就各種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各主要僑校基本上是很難向高度商業化的國際學校路徑轉變。當然，如何可能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強化自身在這個教育市場當中的競爭力，就頗為考驗各僑校的董事會與經營團隊。

然而，就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之下，二〇二〇年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的緬甸軍事政變，為緬甸僑教投入了新的變數。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緬甸也沒有例外的捲入這場全球性的災難之中，醫療資源的不足，社會經濟的停滯，讓緬甸的僑校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位緬甸僑校的前輩（受訪者 D）就指出：「社會經濟停滯、各種防疫物資的有限，學校根本就無法開課，馬上要面對的就是營運的困境，這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當然，因應疫情所帶來的衝擊，諸多僑校也開始採取線上授課的模式，一方面維持基本運作，另一方面也才有可能降低學生以及教師的流失。

除了新冠疫情的衝擊之外，在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更對緬甸帶來全面性的影響。翁山政府時期所推動的各項改革措施，即使沒有戛然而止，能夠如期推動的可能性也大為降低。雖然，西方各國對於緬甸軍政府均表示譴責，且來自於民間社會的抗爭不斷，但至今緬甸軍政府並沒有絲毫的退讓之意。即使已經有大型的外國商業集團（歐美、日本）宣布退出緬甸市場，但同樣沒有能夠動搖緬甸軍政府。所以，隨著這一次的政變，緬甸勢必很難在短期間之內，再次回到自由民主與持續開放，並且被預期能夠逐漸繁榮與成長的路徑上。但這一次的政變和以往尼溫等軍事政府主政，也有些許不同之處。受訪的緬甸僑生（受訪者 M）就表示：「軍政府要的是他爸爸鋪子繼續開，不要離開仰光，維持正常生活，不要出來抗議，一切都好說。但問題是大家都在抗議，根本沒有生意可以做」。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緬甸軍政府到目前為止，起碼沒有要回到所謂的社會主義路線的態度，但事實上也還沒有能夠讓經濟回到如同往昔一般的可能。那麼，在持續開放自由民主的發展與繁榮期待，似乎短期之內沒有期待可能性的狀態之下，緬甸僑校又呈現什麼樣的處境呢？針對這個問題，一位緬甸僑校的管理階層

(受訪者 G) 表示：「很明顯的想要前往海外求學的學生大幅增加，疫情期間、政變之後，申請前往台灣求學，不論是三加四方案、僑大（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大學院校就讀的學生很明顯的增加。而且今年該校的學生人數，也大幅度增加。」對於這樣的說法，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訊，二〇二二年申請來台就學的緬甸僑生，總數將近一千人左右。⁵³這是近年來，前所未有的情況。

由以上的討論與分析，我們了解到，緬甸的自由化民主化，為緬甸僑教帶來的是市場化競爭的壓力，以及不得不有所回應與作為。但背負著社會與教育責任的使命之下，事實上緬甸僑校面臨著，發展路徑選擇上，難以言喻的壓力與挑戰。隨之而來的二〇二〇年的新冠疫情，更是緬甸僑校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之所以能夠在隨後的二〇二一年軍事政變之後，似乎有著那一點持續經營與發展的曙光，除了長期的經營與受到社群的肯定之外。也許曾經因為承載著政治競爭而造成的創痛與學習（保皇派與革命黨之爭、國共之爭），使得緬甸僑教表現得更為內斂與成熟。

陸、代結論：苦難時刻依然堅持綻放的花朵

本文以歷史制度論為主要分析理論，回顧了緬甸近百年來的僑教發展，爬梳了重要的歷史時刻與脈絡，並且在田野調查與重要人士訪談之後，有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就僑教的發展類型而言，清光緒年間到民國初年，正式發展起來的是一個如李盈慧所指出：有著「國家主義與實用主義並重」色彩的僑教體系。但卻也因為承載著清末民初的保皇派與革命黨，以及民國之後的國、共之爭。這個承載著高度政治競爭特質的緬甸僑教，也使得原本的絢爛，卻在緬甸獨立之後繁華落盡。雖然，一度以少數民族學校的狀態，在軍政府時期，苦心延續僑教，但並沒有因此失去發展的動力與初心。

隨後，在緬甸軍事統治社會控制壓力相對降低，緬甸多民族、各邦各省有一定程度差異的政治社會環境，以及僑界與台灣的支持之下，緬甸僑教於緬北各地（曼德勒、眉苗、臘戍、黑河、密支那等地）再一次興起。雖然，絕大多數僑校僅能以宗教、文化，或是少數族群名義，在課餘時間教授中文，傳遞中華文化，栽培華人學子。但也實質擺脫僅能如同少數族群學校存在的命運，而朝向有著民族主義國際學校的樣態發展。雖然，持續處在人力與物力資源有限，且承受各種壓力的環境當中，但緬甸各主要僑校依然堅持，並且為緬甸華人社群培育人才，讓中華文化可以持續傳承，並且為緬甸社會的發展與未來貢獻一己之力。

⁵³ 實際來台就讀學生人數，目前還沒有官方統計資料可供查詢，這是筆者與相關人士聯繫所得知。

然而，隨著緬甸於二〇一〇年，邁開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腳步，更在翁山政府於二〇一五年上台之後，大幅開放教育市場的政策下，緬甸僑教面臨來自各方的競爭壓力，而必須採取各種可能的措施因應。隨後，更因為二〇二〇年的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緬甸社會的經濟凋敝，使得緬甸僑教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不過，即便面臨諸多的困境，緬甸的僑教依然堅持那傳統華人社群「鄉紳辦學的社會與教育責任」，並沒有朝向高度商業化國際學校的路徑轉型，依然堅守著有著民族主義國際學校特質。正也因為如此的堅持，緬甸僑校在二〇二一年軍事政變之後，再次受到緬甸華人社群的肯定，而能夠為下一代學子的教育與未來，燃起那希望的燈火。

其次，就緬甸僑教的發展路徑觀之，整個路徑的發展，並沒有能夠脫離緬甸政經社會環境，因為英國殖民所留下的多族群，看似有著共同歷史發展，但卻又分離的環境脈絡。而在每一次緬甸的政經脈絡轉變過程當中，除了來自於如台灣的支持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那一份華人傳統文化與價值的影響。就有一位僑校的董事（受訪者 A）表示：「他就是被長輩找來幫忙，也答應了。一下子就二十幾年了，出錢出力。辦教育，讓下一代有希望，這樣就夠了」。筆者相信在每一個關鍵的路徑選擇時刻，為何緬甸僑校依然能夠堅持著那個初心，也許就因為這個社群當中，有為數不少的僑教前輩，依然堅持著。

最後，筆者在回顧與分析了緬甸僑教的發展與變遷之後，認為這百餘年的緬甸僑教正如同，我們為結論所下的標題是那「**苦難時刻依然堅持綻放的花朵**」，在這個不容易的時刻，她依然是那樣的堅持，並且綻放。

引用書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網站，詳細網址為 <http://www.gqb.gov.cn/node2/node3/node5/node9/userobject7ai1272.html>。

中國華文教育網：〈曼德勒福慶語言電腦學校簡介〉，刊登於中國華文教育網，刊登日期 2010/8/25 日，網址為 <http://www.hwjyw.com/info/content/2010/08/25/11211.shtml>。

中國僑聯：〈千萬華僑成東南亞心結 周恩來：解決雙重國籍 消除懷疑〉，刊登於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網站，刊登日期 2016/1/4 日，網址為 <http://www.chinaql.org/n1/2018/0802/c420286-30203736.html>。

林蒲田主編：《華僑教育與華文教育概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年）。

林欣靜：〈仰光僑教，火苗不熄〉，《台灣光華雜誌》，（2012 年）：網址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tw/Articles/Details?Guid=16f1831e-195d-4087-814d-047cc861e3a5>。

李察.考科特：《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廖婉如（譯）（台北：馬可孛羅，2016 年）。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一九一二 ~ 一九四九）》，（新北市：國史館，1997 年）。

李娜：〈傳播中華文化 推動教育發展——重慶師範大學與緬甸新世紀國際教育簽訂合作備忘錄〉，刊登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網站，刊登日期 2018/6/13 日，網址為 <http://www.chinaql.org/BIG5/n1/2018/0625/c419645-30083310.html>。

邱玉蟾：《我國境內國際學校開放規範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

許婧：〈柬埔寨中國學校的首批外派教師 17 日自上海出發，赴柬埔寨任教〉，刊登於新浪香港，刊登日期 2022/7/17 日，網址為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20717/0/1/2/%E9%A6%96%E6%89%B9%E6%9F%AC%E5%9F%94%E5%AF%A8%E4%B8%AD%E5%9C%8B%E5%AD%B8%E6%A0%A1%E5%A4%96%E6%B4%BE%E6%95%99%E5%B8%AB%E8%B5%B4%E6%9F%AC%E4%BB%BB%E6%95%99-14546608.html>。

郝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下冊（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 年）。

楊仲青：《新世紀緬甸僑生在台灣求學經歷與生活經驗輔導工作經驗之建議》（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楊仲青：〈探討緬甸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挑戰〉，《華文世界》，第6卷第115期（2015年），頁106-110。

楊仲青：〈緬甸教育制度的改革對華校發展之衝擊〉，《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學報》，第7期（2016年），頁97-104。

楊勝富：〈我知道的緬甸華僑中學百年歷史：經歷中國內戰的延續，和國共兩黨在海外僑社的競逐〉，刊登於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站，刊登日期 2021/1/25 日，網址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6412>。

陳鴻瑜：《緬甸史》（新北市：台灣商務，2016年）。

葉星：〈解讀緬甸華文學校的高中學歷教育〉，刊登於中國華文教育網網站，刊登日期 2012/5/7 日，網址為 <http://www.hwjyw.com/content/2012/05/07/24651.shtml>。

彥伶：〈緬甸曼德勒孔教學校 歡慶五十周年校慶〉，刊登於台灣 TB 新聞網網站，刊登日期 2016/8/30 日，網址為 <http://tbnews.com.tw/general/20160830-11084.html>。

莊國土：〈論清代華僑與海外保皇派〉，《八桂僑刊》，第2期（2012年6月），頁6-10。

范宏偉：〈1967年緬甸"6.26"排華事件與緬華社會研究〉，《台灣東南亞學刊》，第3卷第2期（2006年），頁47-72。

雲南省僑聯：〈騰衝市僑聯參加緬甸密支那育成學校九十周年校慶〉，刊登於雲南新聞網網站，刊登日期 2018/3/22 日，網址為 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6108771。

董總：〈二〇二二年全球各大學接受華文獨中統考資格之名單〉，刊登於馬來西亞董總網站，網址為 <https://www.dongzong.my/student/index.php/component/sppagebuilder/page/333http://www.chinaql.org/n1/2018/0802/c420286-30203736.html>。

顧長永：《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台北：八方文化，2015年）。

劉務：《緬甸 1988 年以來的民族國家建構研究》（雲南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國務院僑辦：〈中國政府關於華僑華人國籍問題有那些基本原則？〉，刊登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刊登日期 2006/1/17 日，網址為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banshi/2006-01/17/content_160505.htm。

蔣永敬：《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新北市：台灣商務，2011年）。

Holmes, Robert. A, "Burmese Domest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Burmanization," *Asian Survey*, Vol.7, No.3(1967), pp.188-197.

Hall, P.A., & Taylor, R.C.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y*, Vol. 44, No. 4(1996), pp. 936~957.

Krasner, Stephen D,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6, No.2(1984), pp. 223-246.

Koelble, T. A,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27(1995), pp. 221-244.

Levi, Margaret,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9-41.

March, J., & Olsen, J. P,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1984), pp. 734~749.

Mahoney, James,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4(2000), pp.507-548.

Steinmo, S, "What i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 In D. D. Porta & M.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50-178.

Thelen, K., & Steinmo, 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 Steinmo, K. Thelen & F.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2.

Pierson,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2000), pp.251-267.